

“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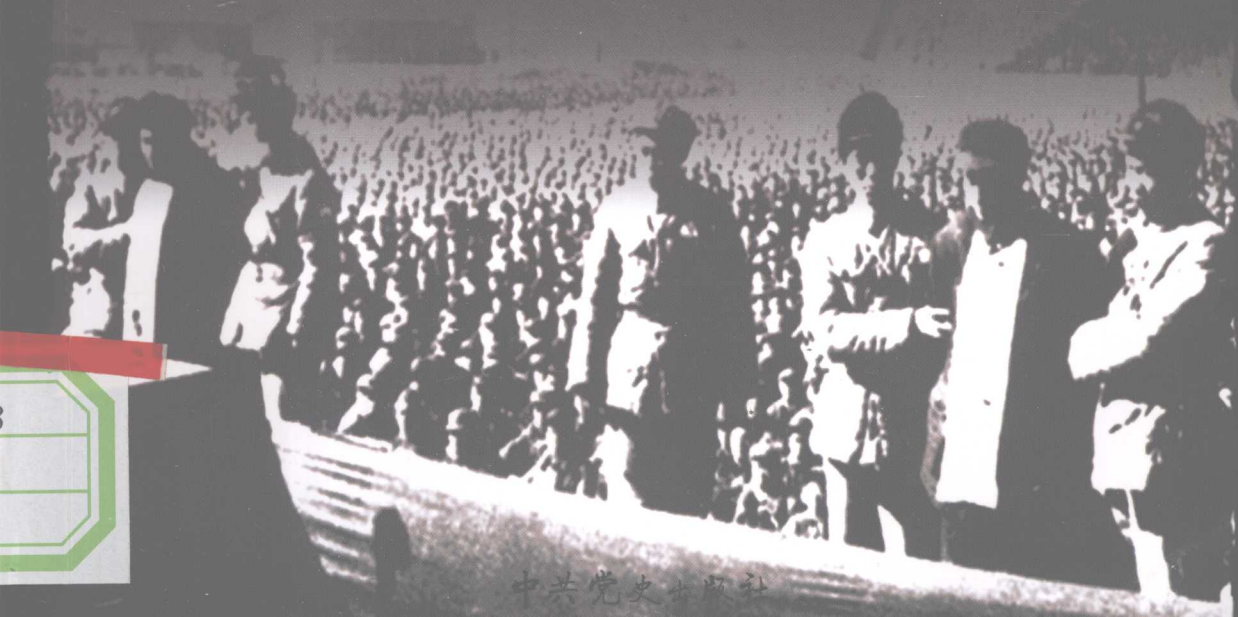
“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

——毛泽东

反腐风暴

开国肃贪第一战

王少军 张福兴◎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反腐风暴

开国肃贪第一战

王少军 张福兴◎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腐风暴：开国肃贪第一战/王少军，张福兴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098-0308-0

I. 反… II. ①王… ②张… III.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
历史事件 IV. D2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87880号

书 名：反腐风暴——开国肃贪第一战

作 者：王少军 张福兴

责任编辑：王鸽子

特约编辑：王华钦 韩志利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216千字

印 张：13.5

版 次：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0308-0

定 价：28.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开篇的话 / 1

上篇 · 警讯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 / 3

跳出“历史周期率” / 8

毛泽东的告诫 / 12

高悬民主监督利剑 / 21

将“第四部分人”清洗出去 / 27

“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 / 40

中篇 · 诫示

来自华北局的 4A 级电报 / 55

“老子该享受享受啦！” / 59

“给我指示个出路” / 72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 / 85

“拿我作个典型吧” / 93

下篇 · 风暴

“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 / 109

“亲自上前线” / 117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 127

中国人民大学“三反”运动个案解剖 / 153

“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 / 158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 177

“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 / 195

结束语 / 207

开篇的话

60年前，公元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从此，古老的中华民族揭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尤爱史书。“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这是他从读史中得出的一条深刻教训。

建国前夕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他的话，不幸而言中。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的典型。建国初期，一个是天津地委书记，一个是天津专署专员。他们都是参加革命20年左右的老党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们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们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赫赫战功。但是，进城后，仅仅两年时间，他们就倒在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由革命的功臣成为人民的罪人。

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远不是一个、两个。新中国刚刚建立，腐败现象就开始在党内滋生起来，其蔓延之迅速，程度之严重，令人震惊，毛泽东曾称之为“贪污浪费的狂澜”。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把胜利与执政称之为进京“赶考”，从成立中纪委到倡导民主监督，从整风到整党，都是为了保证共产党“考个好成绩”。

“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

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面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毛泽东决不手软，用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表明：共产党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

“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了全国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形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场肃贪反腐大风暴。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进城三年，面对反腐倡廉这张大考卷，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考出了好成绩，交出了人民满意的答卷。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重温那段历史，认真总结和思考它的成功经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篇·警讯

1949年春天，西柏坡。新中国即将诞生前夕，毛泽东以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郑重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的告诫不幸而言中。进城不久，腐败现象就开始在党内滋生起来，其蔓延之迅速，程度之严重，令人震惊，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东南西北四面各五间房。院内铺十字甬道，卵石圆润；矗七棵巨柏，四季常青。这里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办公和生活的地方。

1951年11月，初冬的北京已有几分寒意。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菊香书屋里依旧灯火通明。灯光下，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一份令他震惊的报告。

这是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呈送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报告中说，东北地区从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局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了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

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

报告列举了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其中提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 3629 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 5 亿元人民币（注：本书所指均为人民币旧币。1955 年 3 月 1 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的人民币，新币 1 元等于旧币 1 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十分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无人过问。

报告着重概述了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领导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第四，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与发展，群众觉悟的逐渐提高，不断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前进；第六，以一批能力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同时，东北局的报告还谈到了不法资本家对党员干部的腐蚀问题。报告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往来的纪律，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

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展起来的。之所以要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主要是由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面临严峻的经济考验，生产萎缩，交通梗阻，失业众多，民生困苦。据统计，1949 年同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大约 50%，钢产量减少 80%，粮食减少 25%，棉花减少 48%。当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 27 美元，不到亚洲人均 44 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人均 57 美

元的二分之一。这种经济状况，就使得全力恢复国民经济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然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可走。

一方面，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大量增加也加重了财政开支的负担。当时，随着全国各级政权的建立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以及对国民党遗留和起义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国家负担的公教人员数量急剧增加。1949年为700多万人，1950年上升到900多万人。这样，国家的行政开支费用也骤然增加。根据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当年的行政费用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21.4%，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国内经济千疮百孔，亟待复兴；国际形势同样恶化，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悍然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插足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毅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于当年10月19日开赴朝鲜作战，开始了一场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的经济再次进入战时状态，国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战争和进行国防建设。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用开支达28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2.9%。1951年秋，财政部对全国财政状况进行了一次匡算：当年财政支出要比概算增加75%，其中军事费用为55%，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的计划将无法实现，而且还会影响到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毫无疑问，抗美援朝战争对举步维艰的新中国无疑于雪上加霜，大大加重了财政困难的局面。正如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的：“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恢复国民经济，需要资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需要资金，那资金从哪里来？出路何在？答案只有一个：走开源节流的路子。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研究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5点办法：

(1) 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将总兵员从 610 万人减少到 465 万人。(2) 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 紧缩开支，清理资财。(4) 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 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增产节约。

10 月 23 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国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他指出：“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作了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其中专门论述了增产节约问题。他提出，增产节约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财经政策之一。从现在起，要在全国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

毛泽东、陈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受到与会政协委员的一致赞同。会议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

会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场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东北地区是走在前列的，实际上在中央发出正式号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东北是全国解放较早的地区，作为一个大行政区比其他地方早一年进入和平建设状态，机关干部和职员也较早地拥有了控制资源的机会，因而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也就较早地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如沈阳市在一些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发生严重的贪污现象，仅中国煤业建筑公司沈阳分公司、东北纺织管理局沈阳八厂等 4 家单位发生的贪污案，即造成国家损失达 40 余亿元。同时，东北又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沿阵地，在财政经济上压力更大。因此，在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起步较早，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号召也提出得比较早。

1951 年 7 月，沈阳市人民监察委员会针对当时严重的贪污现象，配合各部门开展了一场反贪污斗争，除惩治犯罪分子外，同时在领导作风、管

理制度、干部教育、干部政策等方面加以改进，以防止贪污现象的发生。

8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号召东北局的全体党员及工作人员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据《人民日报》报道，在2000多名干部参加的集会上，高岗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几天后，东北局正式通过了《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由此，东北各地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全面开始，并很快收到了明显成效。

10月22日，东北局又发出一个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要求扩大实行增产节约运动的部门。通报指出：“这一运动不仅在工业与生产部门应该开展，而且在东北所有一切部门，包括财政、贸易、合作、文教、学校与政府其他各部门都要开展起来。”通报要求这些非生产部门，一方面要学习国营厂矿企业开展运动的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目前主要是结合各机关开展的反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制订增产节约与提高工作效率的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增产节约”运动正逐步地超越经济领域，开始和反贪污腐化的“整党”结合起来。

11月1日，高岗就东北地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对运动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

后来，毛泽东曾经讲过：“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贪污浪费问题，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震惊，因为这事关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事关新中国的兴衰成败。共产党刚刚执政，共和国刚刚建立，能不能跳出“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跳出“历史周期率”

历史周期率，是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朝代兴衰更替现象的描述和概括。其基本内涵是说，历朝历代的统治都经历了一个取得政权、巩固发展、停滞腐败、最终灭亡这样一个周期。这个周期有长有短，但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实质上就是要使人民民主政权永葆青春，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永远稳固。

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进行过深入的思考。

当时，围绕抗战胜利后如何建国的問題，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谈判已经濒于破裂。1945年5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一个内部报告中，露骨地叫嚷：“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同时，为了欺骗舆论，蒙蔽人民，国民党决定在7月7日抗战爆发纪念日召开国民参政会，为随后准备举行的所谓“国民大会”作准备。

国共两党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了中间势力的不安，他们企图居中调停。6月2日，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和褚辅成、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人，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商谈，合作抗日，合作建国。

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决定拒绝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以示抗议。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不出席这次参政会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作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国民党蒋介石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随后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不参加国民参政会，就是把一个问题摆到美蒋面前，把球踢给了美蒋，同时使中间派有文章可做。

为了进一步争取中间势力，向他们阐明我党的政治主张，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黄炎培等人，邀请他们访问延安，表示愿意与他们共商国是。

黄炎培，字任之，社会人士习称“黄任老”，生于1878年，比毛泽东大15岁。1917年，他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致力于职业教育救国，造福于民。1940年，他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民主人士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这次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他们当即决定访问延安，为促进国共和谈与和平、民主贡献一份力量。

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等一行6人从重庆飞抵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央领导人的隆重欢迎。

第二天下午，黄炎培等人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住所做客。

当黄炎培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时，他的目光立即被墙上挂的一幅画吸引住了：一把酒壶，壶上写着“茅台”两字，旁边是几只酒杯。尤其是上面的题词别具风采：“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对于这幅画，黄炎培再熟悉不过了。这是1943年沈叔羊为父亲沈钧儒所画，当时请黄炎培为画题词。黄炎培看着画上的酒壶，忽然想起长征中红军过茅台时，曾在茅台酒池里洗脚的传说，于是写下了上面这首七绝题诗。他没有想到是，这幅画竟会出现在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客厅里，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知遇之感。

从2日到4日，在3天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同黄炎培等人多次倾心交谈。虽然双方是头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畅所欲言，谈得十分投机，十分坦诚，十分恳切。谈话中，黄炎培、褚辅成等人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希望两党重开谈判。毛泽东诙谐地回答说：谈判的大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这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经过协商，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一是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是从速召开政治会议。黄炎培、褚辅成等人同意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提出建议：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在此条件下，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

黄炎培、褚辅成等人在延安期间，除与中共领导人谈话外，还参观了延安的工厂、农村、学校。当时在重庆，国民党官员贪污腐化成风，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看到陕甘宁边区井井有序的新气象和广大军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深感延安和重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共产党必将取得天下。黄炎培尤其对延安街头的意见箱很感兴趣，他了解到，这里每一

个普通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这个意见箱直接向毛泽东反映,他觉得非常新鲜。黄炎培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认为政府能做到对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负责,那么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7月4日下午,毛泽东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邀请黄炎培作了一次长谈。

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诚恳地问:“来延安几天了,您有什么感想啊?”

“延安生机勃勃,大出我的意料。”黄炎培感慨地说。接着,他坦诚地向毛泽东谈起了一个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最后,他询问毛泽东,中共是否找到了跳出这周期率的方法。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一直在认真地听着。在黄炎培谈完自己的见解后,沉思了一下,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民主!”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精神为之一振。他马上赞同道:“这话是对的!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7月5日,在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离开延安飞返重庆前,正值邹韬奋逝世1周年,黄炎培写了一篇《韬奋逝世一周年哀词》。在这篇哀词的末尾,他满怀信心地写道:“民主!民主!君所大声疾呼者,虽不获见于生前,终将实现于生后。”

黄炎培返回重庆后,根据自己在延安的见闻,很快写成了《延安归来》

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这本书初版就印刷了2万册，很快被热心的读者抢购一空，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开始寄托在共产党人的身上。1949年春，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毅然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潜离上海，来到解放区，参加新中国的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应毛泽东的邀请，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

无独有偶。在北平和平解放时，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将军也向中共代表戎子和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他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

黄炎培、傅作义等爱国人士都亲身经历过满清末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腐败现实，担心共产党执政后也会从兴旺走向腐败，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政治腐败导致政权灭亡，似乎成了一条规律，从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直到民国时期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每个朝代的兴亡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因统治集团的政治腐败而垮台。一般情况下，新王朝在创建过程中和建立之初，创业者往往能够借鉴前朝覆亡的教训，励精图治，整肃朝政，以巩固政权。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太平盛世后，则开始忘记创业的艰辛，过起贪图安逸、奢靡享乐的腐朽生活，政权也随之走向衰亡。更有甚者，有的创业者打下天下之日，就立即走向了腐败，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起义大军推翻明王朝，打进北京时，李自成以为打下江山，天下就太平了，马上就住进了皇宫，当起了皇帝，而他的几十万大军则囤积在京城，掠夺民财，尽情享受。结果，清兵开进山海关，打得李自成仓皇而逃，刚刚打下的江山又拱手让给了满清王朝。

毛泽东精通历史，善于总结中外历代王朝人亡政息的历史经验。因此，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他反复告诫全党，以史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的告诫

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河北省平山县境内，有一个风光秀美、环境郁静、文化悠久、居民朴实的小山村——西柏坡。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前委移住西柏坡，与先期来到这里展开工作的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会合。从此，西柏坡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成为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一个人民的新中国呼之欲出。

在新中国即将诞生，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关键时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始终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共产党执政后，如何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如何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作风。对此，毛泽东已经深思熟虑，成竹在胸。早在延安整风时期，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他告诫大家：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这里提到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指1944年3月，著名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由1944年向前推300年，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是农历甲申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经过17年的浴血奋战，于3月19日攻破北京城，崇祯帝在绝望中自缢煤山，宣告了明王朝的灭亡和起义军的胜利。但是，起义军将领们并没有乘胜追击，巩固政权，而是麻痹轻敌，过分地陶醉于胜利之中，生活腐化，以至于清兵入关后，大败而逃，李自成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城。郭沫若的文章以此为背景，从历史的角度，总结了明朝灭亡的原因和李自成进入北京后，陶醉于胜利与沉溺于安逸而招致失败的教训。文中不乏精彩之笔，特摘录几段：